

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内生动力、 学术基础与学科框架

徐 进

摘 要：国际关系学要想在中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实现从“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到“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转型，就必须找到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学术基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国际主客观因素叠加生成了复杂的现实问题，产生了迫切的现实需求。解释现实问题、回应现实需求，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最强大的内生动力。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日益丰富的话语体系。新中国外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中国数千年的灿烂文明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和思想资源。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建设一方面要追求学术性和原创性，另一方面也要致力于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一题五观”来概括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框架。“一题”是指一个核心研究主题，即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五观”是指时代观、国家安全观、国际秩序观、全球治理观、国际关系建设观。“一题五观”这个框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浓厚的学术性和高度集成性，可以涵盖众多的国际问题重要研究领域，可以生成更多的重要研究问题。

关键词：中国国际关系学 内生动力 核心主题 知识来源 学科框架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23)02-0022-20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指导其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滋养其发展的主要是中体西用的国外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学要想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要想实现从“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到“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转型，就必须找到学科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内生动力与学术基础。^①内生动力的生成取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能不能回应时代对于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各种要求，学术

^① 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以及其他应用研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起到不同的作用。但限于篇幅原因，本文所称的学术基础主要是指学理研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影响。

基础的形成是指能不能利用我们已有的知识资源，找到理论建设的核心主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国际关系学何尝不是如此。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源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而不同的国际关系时期需要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因此，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动态演化的社会科学。目前，国际关系中的新问题层出不穷，既突显了现有理论有效供给的不足，同时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巨大空间。

一、内生动力

习近平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新时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②时代要求的确是学术发展最强大最深厚的外生动力。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的“东升西降”，国际社会的“四化”趋势，全球治理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稳致远，这些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叠加生成了复杂的现实问题，产生了迫切的现实需求。解释现实问题、回应现实需求，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最强大的内生动力。

（一）构筑中国崛起的解释范式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崛起以及中美实力差距的实质性缩小是国际格局“东升西降”最本质的含义。因此，如何解释中国的崛起并预测未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展趋势是当前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热门话题。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根据自身历史记忆与理论遗产，将中国纳入“崛起国对抗守成国”的理论框架，并极力渲染“修昔底德陷阱”等悲剧性假说。大量西方学者不管其自身的理论倾向如何，不管采取哪种解释逻辑，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政策立场都是大致相同的，即不欢迎中国的崛起，并呼吁西方世界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他们建立各种理论模型并搜寻各类历史材料意图证实他们所谓的“现状”（美国的霸权地位）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而不会去认真探讨崛起国成功崛起的可能性与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页。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1版。

略。^①因此，研究崛起国成功崛起的可能性与相应战略的工作就自然落到了中国学者的肩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构筑中国崛起的解释范式并非易事，这意味着较大程度甚至是突破性的理论创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建设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放在一边，彻底另起炉灶，而是要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博采中西之长，以科学的方式创新出一套新的解释范式。

（二）推动外交事业进步的客观要求

政府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需求方和消费者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于对外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认识和要求不断提高，而决策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政策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学理性之上。由此可知，中国政府在制订和实践外交政策的过程中需要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指导。虽然，国际关系学研究和外交工作不是一回事，不能等同视之，但两者有交叉之处，可以相互促进。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官不一定需要精通国际关系学，但有必要了解一些国际关系学的原理和概念，特别是那些中国原创性的原理和概念，以便他们更好地进行决策和执行政策。近四十年以来，中国外交之所以能不断取得伟大的成就，除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及外交人员实践经验的积累，也离不开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基础。

（三）培育社会各界国际观的基本视野

国际关系学本来是一门庙堂学问，其传统上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间关系，研究者是大学教授或专业智库研究人员，消费者是政府部门。随着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国际社会与国内各界的合作范围更加广泛，合作力度前所未有的，中国面对的国际事务日益复杂。在此背景下，昔日的“庙堂之学”逐渐下移至寻常百姓家，普通百姓和公司企业也有了学习和运用国际关系学的兴趣和必要性，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另一个需求方和消费者。

随着交通工具、通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

^① 绝不能断言所有的西方学者都反对中国崛起，一些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倾向的学者并不反对中国崛起。比如，乔万尼·阿瑞吉著，路爱国等译：《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萨米尔·阿明：《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欧洲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比》，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第63-72页。在西方国际关系主流学者中，康灿雄等少数人对中国崛起持谨慎乐观态度。比如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2021年12月17日，在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举办的讨论会上，康灿雄与支持美国遏制中国的米尔斯海默进行辩论，明确表示反对遏制中国。关于此次会议的情况，请参见https://www.guancha.cn/MiErSiHaiMo/2022_01_09_621561.shtml。

大范围普及，国际关系已不再是政府垄断的公共事务，不再仅仅是政治家和外交官才关心的国家大事，而且成为民众关注的日常事务。国际问题的国内化和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两种趋势相互交织，使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能够逃避国际关系对其生活的影响，就连太平洋上的小岛国国民和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也无法回避。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抬升，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其赖以生存的岛屿就会被海水淹没。小岛国民众和爱斯基摩人现已成为旨在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的积极支持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正在迅速缩小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差距，国际影响力日益增长，这些事实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国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国人需要树立自己的国际观。但问题在于，虽然人们随时可以从各类媒体上了解到最新的国际时事动态，但要想对事件的真伪、趋势、影响和原因做出判断，则需要掌握一定的国际关系学常识。虽然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中国扎下根来，各类国际关系学的教科书供给充足，但我们仍然缺少讲述中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的著作。或许不少中国民众听说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等中国提出的国际关系概念，但要想正确运用这些概念来分析和审视国际事态的发展，要想把这些概念系统化地串连起来以形成自己的国际观，深入浅出地论述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基本概念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要做的事。

全球化的发展使经济和政治这两个以前相对分离的领域日益融合在一起。当前，不仅是政府经济部门的官员，而且经济领域的微观主体企业也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融合所带来的影响。经济问题的政治化正在强烈冲击着中国的国际化企业，对它们的企业绩效、发展战略和市场方向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后果。自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中国的多家企业，包括中兴、华为、字节跳动，都感受到国际政治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是单个企业能够自行承担和消化的，它们必须与本国政府以及外国企业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据悉，华为等公司已经设有专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的部门，招聘了不少国际关系专业人士。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到全世界，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世界各国都想尽快从受疫情影响的经济困难中解脱出来，但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供应链安全问题。供应链本来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在疫情背景下，它被高度政治化了。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供应链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在全球配置的，但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现在都以政治的眼光来看待供应链的安全，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缩短供应链或使供应链本土化。各国政府有意重新配置供应链将影响到链条上的多个企业，包括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不管中国的企业如何应对这一趋势，一定程度的国际关系学知识是不可少的。另外，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大量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

陌生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环境中打拼，生存、扎根和发展决非易事，了解驻在国的国情，了解中国与驻在国的关系，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助于这些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总之，中国的企业不是在单纯的市场经济浪潮中拼搏，而是在一个经济与政治高度融合的国际环境中奋斗。

二、学术基础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比较完整的学术体系，不断涌现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及渐进成长的话语体系。^①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外交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中国数千年的灿烂文明给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和思想资源。我们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努力是力图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登得更高、望得更远。

（一）不断涌现的理论创新成果

自2010年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进入理论创新阶段，出现了一些标志性成果，阎学通、秦亚青、唐世平等学者的原创性成果分别在世界顶级学术出版平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国际主流学界开始承认中国国际关系学学者的自主理论创新能力。另外，上海一批学者提出的“共生理论”也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具有不小的发展潜力。

1. 道义现实主义

从2005年开始，阎学通发起并率领一批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和古代东亚历史经验。^②2012年初，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的张锋博士发表长篇学术评论文章，将阎学通及其清华团队的研究取向定名为“清华路径”（Tsinghua Approach）。^③2015年，阎学通出版了名为《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的专著，正式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

①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发展，因前人已有总结，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者可参考任晓：《中国国际关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周弘主编：《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7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张宇燕主编：《当代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 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Yan Xuetong, eds. by Daniel A Bell and Sun Zhe,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trans. Edmund Ryde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③ Zhang Feng, “The Tsinghua Approach and the Inception of Chines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1, 2012, p. 75.

理论概念。^①2019年,阎学通出版了名为《领导力与大国崛起》的英文专著,把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推向英语学界。^②

道义现实主义的经验困惑是为什么中国在21世纪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中国如果没有在某方面赶超美国,就不可能缩小与美国实力差距。制度决定论者把现代化、工业化或国家实力的调整增长归因于政治制度,但他们又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如美国的先进,因此制度决定论者已经无法解释中美实力缩小这个经验现象。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困惑是崛起国如何实现对霸权国的权力转移。阎学通借鉴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研究,把大国的政治领导力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把世界权力转移归因于崛起国比主导国更有能力进行改革。他认为,一国政治实力的核心因素是该国领导人的道义水平,而该国政治实力在国际层面就体现为该国的国际领导力。在国内方面,一国的国内领导类型可分为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和争斗型,国际领导类型可分为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这样,道义现实主义就用同一变量来解释为什么在同一历史阶段,主导国会衰落,某个国家会崛起成功,而有些国家会崛起失败。而且,主导国和崛起国的不同领导类型可重塑国际格局、秩序、规范、世界中心乃至整个国际体系。道义水平越高的领导类型国家,越有可能促成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国际规范,越有可能实现和保持国际秩序的稳定;道义水平越低的国家,越有可能导致国际体系陷入分裂、对抗和背叛。^③

总的来说,道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流派,但也是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只强调实力、不考虑道义的重要反思。道义现实主义的创新点在于对权力转移的原理和路径有新发现。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引入了国家的政治领导力这个重要变量,并且将国家的政治领导力视为其战略选择以及崛起成败的核心因素。道义现实主义的这种政治决定论思想来源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而正是这种政治决定论的哲学理论使道义现实主义对国际权力转移原理有了比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更深入的认识。

2.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

秦亚青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深受建构主义影响的学者。近年来,秦亚青受建构主义强调的国际体系过程性因素以及身份建构机制的启发,同时借鉴中国传统

① 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该书中文版于2020年推出。阎学通著,李佩芝译:《大国领导力》,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

③ 阎学通:《大国领导力》,前言,第VIII页。

文化中的“关系”思想，发展出一个基于观念主义本体论的关系理论。

与阎学通从经验困惑中提炼核心问题进而创建理论模式不同，秦亚青从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缺陷出发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包括国家在内的行为体首先是关系中的行为体。然而遗憾的是，国际关系这门学科从未对“关系”本身做出理论上的解释。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秦亚青将“关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和核心概念。关系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系”概念引入理论。秦亚青认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儒家文化的产物。将“关系”置于理论建构的核心位置，就是要提炼出国际政治的“关系性”。^①

在将“关系”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秦亚青突出了过程的重要性。过程的重要意义在于过程通过互主性实践关系孕育规范、培育集体情感和催生集体认同。^②由于过程的核心是关系，而关系又是与西方社会性质的核心理念“理性”截然不同的理念。因此，秦亚青将“关系”将这一中式理念进行概念化处理，从而确立了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包括关系本位的假定、关系确定身份的假定、关系孕化权力的假定。^③

从关系性这一基本概念出发，关系理论认为，决定一个体系特征的不是体系单元的自身特征，而是这些单元之间的关系类型。不同的关系类型导致不同体系的不同治理形式和秩序原则。关系理论还认为，个体理性虽然重要，但在本性论上应服从于关系性，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国家）知晓自己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身份后，他（它）才会知道什么行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理性不是先验的，而是后验的。由此，关系理论认为管理关系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④

关于关系性这个中国式概念是否具有普适性意义，秦亚青指出，具有局部地缘文化背景的社会科学理论能够升华到具有普适意义的层面。虽然不同社会对关系性的解读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但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不以关系性作为自己的定义性特征。正是因为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有着普适性的潜力，所以，这一理论模式也就可能产生普适性的意义。^⑤

3.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

唐世平的研究兴趣比较广泛，在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制度经济学、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哲学等领域都有广泛的著述。当然，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说，

①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页。

② 同上，第74—80页。

③ 同上，第80—85页。

④ Yaqing Qin,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⑤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第86页。

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国际关系的社会演化理论，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当中。^①他在另一部著作《论社会演化：现象与范式》中将社会演化理论从国际关系领域推广到人类社会领域，从而使该理论有了更广泛的适用性。^②唐世平在创立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过程中并未嫁接中国元素，这一点是他与阎学通和秦亚青最大的不同。

唐世平借鉴吸收了生物演化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演化主义范式。他将公元前8000年至今的国际政治分为四个阶段：伊甸园世界、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世界。由这四个世界构成的国际政治系统像生态系统一样在不断演化，都遵循“变异—选择—遗传”这一演化机制。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的学术意义有两点。一是它批评现有的体系理论只能理解一个体系内的动态性，但是不能解释不同体系间的进化。二是它指出所谓“国际政治的本质一直以来都没有根本性变化”的假定是错误的，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演化的体系，故而试图用一个大理论来解释整个国际政治的历史，就注定是行不通的。换句话说，三大主流理论可能适用于三个不同的国际政治时代。

总之，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消解了多年以来国际关系领域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争论，用社会演化范式为国际政治演变提供了一以贯之的内生解释，同时也用社会演化的眼光展望了国际政治未来的发展。另外，这一理论是借鉴了生物学的基本原理而发展出来的，这也提醒我们，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也需要使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有时候跨界是必须的。

4. 国际政治的“共生理论”

国际政治的“共生理论”（以下简称“共生论”）是由一批上海学者在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汲取中国先贤的“和合共生”思想，并结合中国外交实践提出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共生”由此成为国际关系“上海学派”的核心概念，体现了“上海学派”海纳百川、包容共生的特点。^③“共生”原为生物学名词，基于生物共生论的原理，胡守钧教授将生物共生原理引入社会学领域，提出了“社会

^① 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该书于2015年获国际研究协会（ISA）最佳年度著作奖，中文版于2017年面世，唐世平著，董杰旻、朱鸣译：《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② Shiping Tang, *On Social Evolution: Phenomenon and Paradigm*,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③ 关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上海学派”的详细介绍参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课题组：《海纳百川、包容共生的“上海学派”》，载《国际展望》，2014年第6期，第1—17页。该文对“上海学派”的界定为：以“共生”概念为基础，逐渐发展出以“国际共生论”为核心，以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治理、议题关联等为外围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

共生论”，即共生是不同的个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①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前秘书长金应忠先生又将“社会共生论”引介至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提出“国际社会共生性是普遍有效的”理论命题，由此推动了上海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社会的共生性”“共生性国际体系”等相关主题的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以“共生”概念为基础、以“国际共生论”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议程。^②

国际共生论包含了以下几点核心要义：第一，共生是现代国家（包括国际组织）的基本存在方式。^③国家存在于国际共生环境中，国家的性质与国家间的互动由国际共生关系决定。^④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间的同类型的互动是国际共生关系的生成、维持与演化机制。^⑤第二，国际共生论是由团结、平等、公道、共生的概念体系所支撑。^⑥国际共生论超越了二元对立思维，体现了多元价值以及中式“合解”思维，即认可差异、尊重差异、平等相待、矛盾统一、多元共生共长。^⑦第三，共生型国际体系是国际共生论的核心研究议题。^⑧和平共处、和平共生与和谐共生是共生型国际社会的三个发展阶段。第四，国际共生论的提出与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国际共生论与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走和平发展路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思想密不可分，同时也是中国走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建设需要。^⑨国际共生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由和平共处与和平共生到和谐

① 胡守钧：《社会共生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课题组：《海纳百川、包容共生的“上海学派”》，载《国际展望》，2014年第6期，第2页。

③ 胡守钧：《国际共生论》，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42页。

④ 同上，第36页。

⑤ 同上，第40页。

⑥ 苏长和：《共生、国际共生体系与中国外交实践》，载《社会观察》，2014年第8期，第24页。

⑦ 任晓：《论国际共生的价值基础——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4-28页；苏长和：《以新普遍主义建构世界秩序——对共生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1期，第35-38页。

⑧ 关于共生型国际体系的主要文献参见：金应忠：《共生性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43-49页；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4-22页；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4-22页；蔡亮：《共生性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的道、术、势》，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第52-62页。

⑨ 杨洁勉：《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强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准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8期，第149-155页；杨洁勉：《中国走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准备——阶段性使命和建构性重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第4-14页。

共生的跨越，构建“利益—责任—命运”的共同体，建设一个良性互动、和平发展的国际社会。^①

5. 天下理论

当国际关系学者们主要从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权力这个角度出发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探讨之时，哲学家出身的赵汀阳则从中国历史与哲学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以“天下体系”为核心概念的政治理论，而这个理论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赵汀阳认为天下体系所包含的世界制度来源于周朝。^②周试图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单位去治理，而最终形成的世界制度就是天下体系。当各国都加入这个制度时才有了世界，从而世界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的必要条件，有序世界成为有序国家的必要条件。^③尽管古代的地理交通和人们对世界的地理认知不如现在广泛，但周朝“世界制度”对天下体系的认知满足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天下体系是一个利益普遍共享体系；第二，天下体系制度能够保证各国都获得足够大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各国都愿意加入这个体系；第三，天下体系可以使各国之间形成利益相互依存的互惠关系，使得体系中的各国和谐共处，有利于世界和平繁荣发展。

天下理论是建立在民族国家之上的、以治世为目标的政治理论，视角不同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为例，该理论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分析国家之间的权力变化而导致的冲突与战争。但天下理论认为，西方倡导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只是国内制度，而非世界性的制度。国内制度的有效约束范围是民族国家内部，而非世界，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之间不具备有约束力的制度。因此，赵汀阳认为正是由于世界制度的缺失，才造就了世界体系的无秩序与无约束，导致出现失控空间。^④这样的世界体系也就是霍布斯丛林法则下的世界。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今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需要一个以世界为单位的体系，而天下理论就是以治理完整世界和人类共同利益而构建的理论，它是任何可能世界制度的形而上学。

天下理论的创新性有三点。首先，天下体系强调“天下为公”。将此概念具象化理解并赋予当今世界政治的意义，便是指世界（天下）的治理应该由好的政府来领导，因为好政府不会将天下的利益都夺取为一国的利益。与之相反，当

① 张春：《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第11页。

② 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61页。

③ 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载《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第3-4页。

④ 同上，第32页。

今的世界倘若“天下为家”则会导致霸权的产生，因为霸权国家的政府并不是以治世为目标的；其次，天下体系有助于产生制度最大化。制度最大化和普遍化是指如果一个社会制度是最好的，那么它必须能够成为一个普遍有效的社会制度，而这种社会制度可以扩散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单位。^①由于天下体系是建立在最高的层次上，因此在该层次上产生的世界制度就具备向下的传导性，会从规模较大的政治、社会单元向规模较小的政治、社会单元传播。因此，如果一个制度不能成为世界性的制度，那么它就不能覆盖到全部的单元，这种制度就是不完善的；再次，天下体系建立在共同存在论的基础上，具备对不同文化、民族、制度、国家的包容性。^②天下体系的完整性是依靠体系内丰富的多样性来达成的，因此一个和谐的世界是天下体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天下体系还具备“天下无外”原则，在天下体系中，只有内部性没有外部性，因此没有不可化解的敌人。

天下理论所设想的世界性政治单位，使得该体系下的“国际关系”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关系。国家之间，或是地域之间对“礼”的理解变得十分重要。也就是，天下型国家认为其他国家应该尊重他对天下体系的推崇，但并不强迫其他国家对其朝贡。而连接这种关系的纽带就是国家间对“礼”的理解，也就是处理“际间”关系规则。

（二）渐进成长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与核心内容。如果一个学者，一个学派没有自己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话语，那么这个学者在学术界是没有地位的，这个学派也就是一座“建立在沙子上的宫殿”。当美国学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高呼“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时，他的底气来自于这个现象，这门学科的理论话语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提出或深入阐述的。^③均势、国家利益、软实力、硬实力、相对获益、威慑、“确保相互摧毁”、“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层次分析、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关学界耳熟能详、广泛使用的概念或术语，大多出于美国学者之笔，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和塑造着国际关系学者的思维。

话语体系建设包括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话语认识度和话语权等五项内容。话语主体强调的是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如果学术研究不具备自主性，

① 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载《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第6-10页。

② 赵汀阳，H·费格，S·戈思帕，L·缪勒等：《柏林辩论：天下制度的存在论论证及疑问》，载《世界哲学》，2020年第3期，第89-111页。

③ Stanley Hoffma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Vol. 106, No. 5, 1977, pp.41-59.

也就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与创造动力，只能拾人牙慧，亦步亦趋，更谈不上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话语主体只有创造出高质量的话语内容并通过适宜的话语平台予以有效传播、推广，才可能获得他者的认可，实现学术话语权。一旦学术话语权得以确立，就能够在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上发挥指引导向、鉴定评判与行动支配等作用。^①

近二十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的话语体系建设有所进步，但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就话语主体而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意识日益明确，中国视角得以彰显。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已经认识到打破美国话语霸权，塑造国际关系研究中国特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从2010年以来，简单梳理与套用西方理论的学术成果已经很难在主流专业刊物上刊发。国际关系类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开始走出“三大主义范式”的束缚，源自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日益突显。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初步具备了学科自觉、学派自觉与学术自觉。^②

就话语内容而言，中国学者的话语创新意识明显提升，原创性理论正在生成。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在于话语内容的创新性，尤其是原创性理论的构建。美国的三大主义范式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的基础与理论教学的基本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其话语霸权。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创新意识有所提升，阎学通、秦亚青等学者借助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历史资源来构建原创性理论，并取得了重要突破。但总的来说，中国原创性理论构建还存在两大难题：一是核心问题的缺失。问题是理论研究的起点，要构建原创性理论就必须对核心问题的确立达成基本共识。秦亚青曾提出关于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即中国如何和平融入国际社会。但自提出来之后，这一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系统论证，取得广泛共识，相关理论研究也没有得到有效推进。因此，核心问题的缺失仍然制约着原创性理论的构建。二是理论构建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只有对理论的性质、功能、结构、演进模式与评估标准有十分清晰的认识，研究者才可能构建、发展理论。纵观欧美学界，其原创性理论无不以研究纲领的结构出现，因为任何宏观理论在演进过程中都将遭遇各类反常的挑战。而要保证理论的长期发展，就必须设置强有力的保护带，推动后续理论的发展，共同组成研究纲领。因此，没有理论构建意识的提升，也就无法真正构建原创性理论。^③

① 陈小鼎、王亚琪：《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之争——兼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自觉》，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0页。

②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③ 陈小鼎、王亚琪：《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之争——兼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自觉》，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2页。

就话语平台而言，中国的话语平台建设亟待拓展。缺乏合适的话语平台，就无法实现学术话语的高效传播。在学术话语平台建设上，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相对滞后，设置国际关系专业的高校数量不少，但在学术传播、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当前，学术期刊是学术话语的主阵地。《中国国际政治季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比较早进入政治学专业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的英文期刊，其余刊物大都主要在国内发挥影响。总之，话语平台建设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竞争力。

就话语认识度而言，我们还处于受众意识不强，话语认可度较低的阶段。学术话语权的落脚点是受众的认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特色必须在国际关系研究的整体性与一般性大框架内显现，唯有如此特色才能得到广泛认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之所以能够获取话语主导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西方主导了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使得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非西方国际关系时也具有一定解释力。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存在一个误区，即单方面地试图将中国文化精华贡献给全世界，而忽视了今天的世界、国家乃至人类的思想、概念、行为都已经经过西方现代性的塑造。这就造成了中外、古今之间的断裂，其他国家就很难认可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特色。纳入本土资源是构建话语体系的不二法门，但必须考虑到受众的文化背景，合理转化，从例外中寻找通则，才能提升学术话语的认可度。^①

三、学科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实践和成功经验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其所蕴涵的价值和意义已超出现有西方理论框架的解释范围。但由于西方话语的主导以及中国学术界主体意识的薄弱，我们无法将自身实践及时提炼为理论话语，结果不得不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曾经也是如此，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原创理论，更多的是梳理与简单套用西方理论，这一直是中国学界的心结。国际关系是一门社会科学，而科学思维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我们在承认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普适性和通用性的同时，也要看到不同的文化底蕴、历史进程等因素往往会赋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不同特色。比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从来只会研究确保美国霸权地位的战略，而不会去研究崛起国取代

^① 陈小鼎、王亚琪：《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之争——兼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自觉》，第122-123页。

守成国的战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确实多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其问题意识和关注重点经常不接中国的“地气”，也就无法合理解释中国的许多理念与行为。

（一）“一个主题、五个方面”的学科框架

本文试图从学术和话语两方面入手，构想一个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体系框架。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应当围绕一个核心主题，从五个方面构筑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一个核心主题是：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五个方面分别是：中国所处的时代，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的国际秩序设想，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中国如何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一个主题、五个方面”基本涵盖了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内容。本文把“五个方面”称为“五观”，即时代观、国家安全观、国际秩序观、全球治理观、国际关系建设观。因为在中文语境中，所谓“观”是指对某一事物或某一问题的基本看法或根本观点，比如世界观，是指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在每一个“观”之下，本文总结并分析了一些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和思想成果，这些概念和成果集合起来就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话语体系。我们力图构建并呈现出一种以“学术”为经，以“话语”为纬，经纬交织、纵横结合的体系结构，希望从思想层面搭建起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框架。

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与以往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的区别在于，前者探讨的是学科大厦的建立，而后者探讨的是理论的创新，它们之间是学科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研究多种国际现象，但没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的国际现象，国际关系学包含多种多样的理论。把这些理论集合起来就构成了学科。因此，本文旨在构建一个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大厦，这个大厦有不同的功能分区，而要想实现不同区域的功能，就需要不同的理论。

（二）核心主题的重要性

学术研究的主题是指学术研究的现象领域或问题领域，是相关研究问题的集合，包含着大量的研究问题。^①无论是从历时性还是共时性来看，国际关系学都有众多的研究主题。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曾总结了国际关系学的12个研究主题，包括国家与世界，跨国进步与国际间的相互依存，战争与和平，力量与弱点，国际政治与国际社会，世界人口与粮食、资源和环境，繁荣与贫困，自由与压迫，知觉与错觉，积极与消极，革命与稳定，特性与转变等。^②

^① 关于研究主题和研究问题的区别，请参见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② 卡尔·多伊奇著，周启朋等译：《国际关系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7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涉及的研究主题与国际潮流日益吻合。如果从“国际关系学在中国”这个视角来看,与学术领先的美国学者保持一致是我们可喜的进步。但从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视角来看,努力跟踪并赶上国外学者的研究步伐是远远不够的,也是缺乏学术自主性的表现之一。我们需要的是寻找并确立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核心主题。

确立核心主题是推动学科发展和学术进步的关键环节。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核心主题就是权力政治,或者说是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围绕这一主题,以经典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为起点,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权力与制度之争”,再到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念建构与先验理性之争”,美国学者建立了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各学派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模型与解释路径,并在互相争鸣和融合中刺激理论创新,使理论的解释力不断提升。

欧洲基于对民族国家发展历史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并在这一进程中逐渐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为国际关系研究注入了全新的理念,并对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权观、权力政治观、国际体系观等提出了挑战。当前,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主题是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包括制度合作、区域一体化、安全共同体、民主联盟、国际组织等。美欧在研究主题上形成了鲜明对比,两者的分化体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多元性,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在研究议题设置上的主导权。

受过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训练的人都知道,撰写学术或学位论文之前先要确定研究主题。我们常说的论文选题,是指先选定一个研究主题,然后再在这个研究主题之下选取具体的研究问题。对于学者个人来说,确定研究主题的重要性在于这将决定他(她)在未来一段时间进行研究的总体方向和关注重点。比如,一个学者的研究主题是新世纪的中美关系,那么他将主要关注2000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及问题,而新世纪的中俄关系就不在其关注之列。但是,在不同的研究主题当中,总有少数主题更具有核心性质,因为它们包含有一系列重大的研究问题。也就是说,研究这类主题可以对国际关系学的进步具有更大的意义。因此,对于学术界来说,发现和确立核心主题意义非凡。当然,不同时期的研究主题可能是不一样的。时代发展和重大事件是促使研究主题转换的外部因素。比如,在冷战时期,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美苏战略平衡,而冷战结束之后,这个研究主题的重要性日趋减弱。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美国学界的一个核心主题是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现在这个主题的重要性也在减弱。2010年以后,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实质性减小,特别是2018年以后中美贸易战的进行,应对中国崛起在美国成为热度日高的研究主题。

（三）核心主题的遴选原则

在众多研究主题中选出一个核心主题应遵循三个原则：时代性、学术性和集成性。所谓时代性，是指这个研究主题最切合当时的时代潮流和重大现实问题。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9-1939），当时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就是维持一战后的和平局面。围绕这一现实问题的研究构成了当时国际关系学界的核心主题。所谓学术性，是指这个研究主题对于推进学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大潮的背景下，通过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化的良性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这个研究主题具有跨学科性，可以促使国际关系学吸收经济学、环境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推动国际合作、国际制度、权力政治等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进步。所谓集成性，是指这个研究主题可以集成多个重大的研究问题，形成研究的集群效应。比如，在冷战时期，出于对东西方之间冷战转化为热战的担心，有关如何缓解安全困境这个主题的研究一度非常盛行，集成了包括“攻防平衡论”“商业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等多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吸引了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数个理论流派的顶尖学者参与研究。

从多研究主题中选出核心主题应综合考虑时代性、重要性和集成性原则。在冷战时代，如何在与苏联的对抗中赢得冷战胜利就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核心研究主题。首先，这个研究主题符合那个时代的世界潮流。其次，这个研究主题对应于当时美国以及西方世界面临的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解决这一政治问题过程中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最后，这一研究主题产生了无数的研究问题，吸引了美国最顶尖的国际关系学者参与进来，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学派以及多个的中层理论的建立与发展无不与这一研究主题相关。

（四）核心主题与主要方面

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核心主题是，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是综合考虑时代性、学术性和集成性三原则后得出的结论。

当今时代最重要的国际政治现象之一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引发了国际社会一系列带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变化，特别是使国际格局出现了“东升西降”等趋势，中美之间的综合国力差距正在相对缩小，使得冷战后的“一超多强”格局向多极格局方向逐步转变。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很有可能超越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这将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上重返世界第一，具有非常重大的标志性意义。

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及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都将发生变化，有的双边关系还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反复宣誓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力图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愿意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但愿望不等于

现实，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和都能够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有些国家与中国存在各式各样的矛盾与分歧，包括战略与安全矛盾、领土主权争端、海洋权益争端、经贸纠纷、历史恩怨，等等。应对这些问题始终考验着中国以及有关国家的政府。当今世界还存在许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存在许多全球性问题。日益强大的中国将更有能力去维护世界和平和参与全球治理，但如何在能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等方面取得平衡也将考验着中国以及有关国家的政府。中国崛起将引发国际关系的大幅度变动。中美实力的日趋接近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战略竞争将迫使其他大国认真考虑自己在中美两国之间的政策立场，也迫使中小国家在站队、中立和对冲之间做出选择。中国崛起还将引发国际秩序领导权的激烈竞争。由此可见，中国的崛起将引起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大国战略关系、大国与中小国家关系、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国际秩序的多重剧烈变动，几乎涉及到国际体系所有重大的问题领域，因此其时代性是无可置疑的。

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来看，学界对当时最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都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如何维持一战后的和平局面是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的第一次大辩论，即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辩论，出现了《二十年危机》和《国家间政治》等一批经典名著。在冷战期间，美苏战略竞争以及如何打赢冷战成为当时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涉及到国际关系几乎所有的子学科和所有的问题领域，产生了所有的大理论和大部分中层理论，促进了国际关系学与国内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的跨学科交流。当前，中国的崛起又使世界政治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历史关口，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国际关系理论再次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应当抓住这次机遇，把重大现实问题转化为重大学理议题，不断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

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具有高度的集成性，可以涵盖几乎所有的国际问题重要研究领域，可以生成无数的重要研究问题。事实上，它像是一个大型的研究主题集群，其下可分为多个中小型的研究主题，这些中小型研究主题之下又可再分为不同的研究问题。本文所谓的“五观”就相当于这个大型研究主题下的五个中型研究主题，在每个“观”中又集成了多个研究问题。比如，在全球秩序观这个研究主题之下，就集成了秩序领导权的核心内容和标志、中美如何围绕秩序领导权展开竞争、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研究问题。另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已有的重要原创性成果也可以分别纳入到“五观”之下。赵汀阳的天下理论可以归入全球秩序观，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可以归入

国际关系建设观，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可以归入时代观和国际关系建设观，上海一批学者的共生理论可以归入全球秩序观和国际关系建设观，唐世平的社会演化理论、王逸舟的“仁智大国论”和郭树勇的新文化国际主义等理论学说可以归入国际关系建设观。因此，这一研究主题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可以容纳多种理论观点。

四、结论与展望

时间已经跨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距离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恢复发展国际关系学已历时近四十年。近四十年来，在几代中国国际关系学人共同努力下，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大地上扎下根来，日益枝繁叶茂。2010年以来，中国学者构建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进，使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时机不断成熟，国际关系学这门学问正在从“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向“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不断转型。我们需要在反思西方国际关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构筑起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大厦。

当前，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大厦的三方面建设资源已经具备。这三方面资源分别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主体性、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国的历史文化。自2010年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主体性日益增强。学者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翻译和介绍国外的理论，学习国外的研究方法。他们开始尝试进行理论创新，即创建富有原创性的理论。十年来，学者们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一批成果开始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随着学术自觉意识的强化，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逐渐意识到推动民族文化传统、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研究对接的重要意义。近年来，如何提炼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将中国理念融入国际关系研究，实现理论创新，提升学术话语权成为重要研究议题，尤其是关于“中国学派”的探讨经久不衰。无论对“中国学派”持何种观点，都意味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性得以彰显。主体性的确立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大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建国七十多年来，中国外交以“独立自主、爱好和平”为政策基石，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赞同和接受，包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发展中大国身份，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等。这些成功的外交实践和理论，为我们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提供丰富的理论养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推进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对外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有力提升了中国的战略影响力和制度性话语权，有力推动了国际格局朝着和平、稳定、公正和更加有利于世界发展繁荣的方向演进。2018年6月，党中央在全面总结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以作为今后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提出和确立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了指导思想、关键概念和骨干框架。

在世界所有大国当中，只有中国是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的国家。2011年9月《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列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三大必然原因之一。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积累了丰富的国家间关系经验和教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传统价值观，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源和精神财富。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构建“中国学派”的争论，其核心要义就是如何利用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来创新国际关系理论。

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是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本文试图以“一题五观”来概括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框架。“一题”是指一个核心研究主题，即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五观”是指时代观、国家安全观、国际秩序观、全球治理观、国际关系建设观，这五观基本涵盖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领域。我们期待中国学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能够提出科学的、专业化的学术命题、学术范畴、学术观点、学术思想，注重基本理论的构建和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努力形成自成一家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形成反映当代中国气象、引领世界学术发展的学派。

（作者简介：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北京，102445）

收稿时间：2022年12月

（责任编辑：刘 玉）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Intrinsic Motivation, Academic Foundation, and Discipline Framework

Xu Jin

Abstract: I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discipline is supposed to grow into a towering tree in China and realize the prospect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a” t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foundation for its development.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the once-in-a-century global changes, has produced complex practical problems and urgent practical needs, which are the most powerful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building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discipline in China has had certa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and its discourses are getting increasingly rich. Chinese diplomacy has provided abundant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China’s splendid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provided luxuriant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one hand, the building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should pursue academic and original ideas;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strive to form a new discipli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yle and ethos. Because of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One Topic and Five Views” to summarize the framework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The “One Topic” refers to a core research topic: how a rising China handles its rela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e “Five Views” refer to the views on the world, 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order,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framework of “One Topic and Five Views” can cover almost all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s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generate countless important research questions.

Key Words: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rinsic Motivation; Core Theme; Source of Knowledge; Discipline Framework